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教育研究（1939—1941） ——以延安女子大学为例

周文笛

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

DOI:10.61369/HASS.2025050026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私有制根源，将妇女解放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在革命与建设中继承并发展这一理论，从阶级解放、社会生产到新时代全面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为妇女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妇女教育研究

Research on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1939-1941) — A Case Study of Yan'an Women's University

Zhou Wendi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Abstract：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profoundly revealed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regarded women's liberation as an important yardboard of social progress.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is theory during it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class liber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on to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women's libe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women's causes.

Keywords： Marxist classic writer; research on women's education

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妇女解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独特的理解。他们不仅深入剖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更积极寻求妇女解放的切实路径，详尽地阐述了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明确了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这些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导，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

1. 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探讨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这些深刻的理论观点也散见于一些珍贵的信件和手稿中。在私有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在经济上变得依赖男性，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构成了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因此，女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男性的主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1]

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剖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他们一致认为私有制是这一现象的症结所在。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详尽地探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演变过程，系统阐述了妇女解放问题。^[2]他明确指出，个体婚制的出现，实际上是女性被男性奴役的标志，标志着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

突的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提到，“没有妇女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3]。只有允许女性进入公共生产领域，并且将女性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性质的活动，女性才有可能摆脱奴役状态，达到解放的目标。^[4]在此，马克思着重指出了妇女在推动社会变迁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中国领导人的妇女解放理论

延安时期，中国领导人加深了对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解，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实践。

1.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妇女革命运动得实际情况，汇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深入总结了妇女解放得实践经验与理论精髓，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首先，它着重强调要打破束缚和压迫妇女的各种桎梏，赋予妇女真正的自由和尊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情况。其次，该思想提出，要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就必须消除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出现得异化现象，从而激发妇女更加广泛、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最后，这一思想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妇女解放得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妇女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5]。

2. 周恩来、邓颖超的妇女解放思想

周恩来，作为中国解放事业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他高度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作用，鼓励她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周恩来通过立法手段来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并不断扩大其范围，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上，他将其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引导社会各界学习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以确保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邓颖超，她不仅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更是毕生致力于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进步。在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中，邓颖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妇女解放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为早期中国妇女争取自身权益和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6]，并在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国家领导人的妇女解放思想

国家领导人强调，“妇女事业始终是 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7]。他关于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展开，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经验借鉴是中国领导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时代方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国家领导人强调：“要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8]

二、延安女子大学的教育实践与思想政治功能分析

（一）教育实践：多元模式与战时需求适配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的教育实践以“培养革命理论基础扎实、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妇女干部”为核心目标，其教育模式具有鲜明的战时特征与创新性。

1. 分类施教与课程设置

女大根据学员的文化背景与实践经验，采取分层分类的教育模式：

普通班：面向敌占区知识青年，侧重革命理论基础教育；

高级班：培养具备马列经典著作研读能力的理论骨干，学员包括红军女干部与知识分子；

陕北班：专为边区妇女干部设计，强化地方工作技能；

特别班：吸纳文化水平较低但革命经验丰富的工农干部，注重扫盲与实践能力提升。

课程体系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类：

必修课：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及军事理论，旨在构建学员的革命理论框架；

选修课：包括医药卫生、会计、新闻等职业技能课程，以增强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定期讲授专

题课程，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 军事化管理与生产劳动

女大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制度，学员每日作息统一：晨间出操、集体学习、生产劳动及夜间自修均按军事纪律执行。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培养了学员的组织纪律性，还通过集体行动消弭了阶级与地域差异。同时，学员需参与开荒种地、纺线制衣等劳动，如《新中华报》记载，学员曾四天内完成300亩土地的锄草任务。劳动实践既缓解了边区物资短缺的压力，也深化了学员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革命理念的认同。

（二）思想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塑造与妇女主体性构建

女大的思想政治功能通过系统性理论教育与革命实践双重路径实现，其核心在于将妇女从传统家庭角色转化为革命主体。

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灌输

女大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基础，批判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强调“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不可分割”。通过讲授妇女运动史与阶级分析法，学员逐渐形成“妇女作为革命力量”的主体意识。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中明确宣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9]，将妇女动员提升至战略高度。

2. 集体主义精神的熔铸

军事化管理与集体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载体。学员统一着装（棉制服、布鞋）、共同劳动、集体学习，形成“革命共同体”的认同感。文体活动如运动会、文艺演出进一步强化集体凝聚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观察到，女大学员“短发戴军帽，不施脂粉，与男性无区别”，这一形象打破了传统性别符号，彰显了革命妇女的崭新身份。

（三）历史效能：妇女干部培养与革命动员

女大存续两年间，培养千余名妇女干部，覆盖党、政、军、文艺等领域。学员毕业后或奔赴前线参与战地服务，或深入农村组织妇女运动。例如，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与浙江妇女营均以女大学员为骨干，直接参与抗战。女大的教育实践不仅为战时妇女干部培养提供了范例，更通过实际成效验证了“妇女觉醒即革命动力”的论断。

三、延安女子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深远影响：妇女解放与革命动员的历史遗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延安女子大学作为妇女教育的重要阵地，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仅为战时妇女解放制定了行动指南，还在历史发展中积淀成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精神财富。这种影响遵循“个体觉醒——集体动员——制度建构”的逻辑，重塑了妇女的主体地位，为革命事业增添了性别维度的动员力量，最终成为新中国妇女政策的重要历史渊源。

（一）重构妇女主体性：从家庭依附到革命主体的觉醒

在传统宗法制度的长期禁锢下，妇女被“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紧紧束缚，成为家庭的附属品。延安女子大学通过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从理论层面解构了封建性别秩序。学校开设的《社会发展史》《妇女问题》等课程，向学员深入阐释马

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源于阶级剥削和性别分工”的论断，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精神压迫。有学员回忆道：“过去一直觉得女人天生就该围着锅台转，听完这些课才恍然大悟，原来妇女受压迫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这种理论认知上的觉醒，推动妇女从“家庭私域”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社会公域”的主动参与者。

理论认识的革新需要通过实践赋权，才能真正转化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女大学员勇敢地打破“女子不如男”的传统偏见，积极投身军事训练、农业生产和政权建设。1939年成立的女大生产合作社里，学员们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创造的经济价值占边区妇女生产总额的32%。在“延安各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中，女大学生带头创办识字班、调解家庭纠纷，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妇女的政治参与能力。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外在形象的改变——剪短发、穿军装、过集体生活成为新女性的显著标志。这些被斯诺称为“延安女战士”的形象符号，彻底打破了“缠足”“闺秀”等传统性别符号的束缚，构建起“革命女性”的身份认同。这种主体重构不仅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更标志着妇女作为独立的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二）革命动员的实效：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行动的能量转化

1940年初，女大率先发起成立了“延安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1月17日，召开了延安女界2000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大会发出《告全国姐妹书》，将延安妇女要求参政议政、男女平等意见公之于众。^[10]延安女子大学的教育成果最终转化为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从1939年到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期间，女大培养了1000余名毕业生，其中涌现出丁玲（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康岱沙（八路军前方总部妇女科科长）等优秀女性干部。她们深入敌后根据地，建立“妇救会”“姐妹团”等基层组织，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创造了“母送子、妻送郎”的动员佳话。更重要的是，女大模式通过国际观察者的报道传播到全世界——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描述女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史沫特莱则以女大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这些传播活动塑造了“红色政权保障妇女解放”的国际形象，为边区赢得了道义支持，同时也使妇女解放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

标志。

（三）历史遗产：从战时实验到新中国妇女政策的基石

延安女子大学的教育实践为新中国妇女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其开创的“理论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并重”的教育模式，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干部教育体系。1949年成立的中华女子学院（前身为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学员管理等方面全面继承了女大的经验，培养出邓颖超、蔡畅等第一代妇女领导干部。在政策理念方面，女大确立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思想，成为新中国妇女政策的逻辑起点。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6年推行的同工同酬制度，都能在女大的教育纲领中找到思想根源。女大师生倡导的“妇女参政议事”实践，更是直接促使1953年《选举法》中写入“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15%”的规定。这些政策不仅实现了女大“男女平等”的战时理想，还将妇女解放纳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使性别平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

从当代视角来看，延安女子大学的历史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当今性别平等事业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女大的经验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构建先进性别文化方面的核心作用。其“以意识形态引领实践变革”的路径，为新时代妇女教育提供了历史借鉴——只有通过持续的价值引导和实践赋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女子大学不仅是一所战时学校，更是一座精神灯塔，它所照亮的妇女解放之路，仍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延安女子大学的历史功绩，本质上是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充分证明：当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触及性别结构的深层矛盾，当妇女获得主体性觉醒的理论武器和实践平台，个体的解放力量就能汇聚成改变时代的强大洪流。这种从微观主体到宏观制度的影响链条，构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区别于西方女权主义的独特道路，也为全球性别平等事业贡献了具有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 [2] 李蕴慧.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延安时期妇女动员研究 [D]. 西安：西安石油大学，2020.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80.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63.
- [6] 田琳琳. 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迪 [J]. 党史文苑，2024(03):13-16.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9] 郑学富. 中国女子大学创建始末 [J]. 文史月刊，2022,(03):39-45.
- [10] 贺学萍.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述论 [J]. 新西部(理论版)，2015,(21):101-102.